

# 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改革与调适

□ 邢来顺

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两次工业革命为动能的高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引人瞩目。在这些亮丽的现代化成就背后，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和调适起着无法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从19世纪初教育现代化起步到20世纪初成长为世界教育领先国家，德国的教育改革和调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19 世纪初普鲁士教育改革与德国教育体制的现代转轨

早在17、18世纪，德国教育已经初露现代化端倪，出现了世俗化、国家化和大众化的趋势。当时教会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开始出现兼具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特点的实科中学。大学教育中除宗教神学课程外，历史、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等日益成为重要学科。一些邦国开始颁布强制适龄儿童入学的教育法令，以此推动教育的大众化。

德国教育的现代转轨始于19世纪初。当时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影响，德国各邦进行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改革”，教育改革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各邦教育改革中，又以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领导的教育改革最具典型意义。它不仅使军事上被打败的德国在精神上“筑起抵抗外族统治的长城”，而且使德国教育开始迈入先进行列。

洪堡教育改革以教育国家化、大众化和实用化为指向。一是确立国家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权。通过建立从中央内政部教育司到各省、县教育局的各级教育管理系统，创立国家考试制度，设置对升入大学学习、毕业资格和教师能力的认定考试等，确立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权威地位。二是设立三级学校教育体制。首先，以“教育服务于国民”为宗旨，推广初等教育。大力发展师范教育以提高小学师资数量和质量，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减少宗教神学课程，增设实用知识课程。其次，整顿各类中学，提升中学教学质量。一方面规定只有文科中学毕业生才能升入大学或担任国家官吏，另一方面建立中学教师合格考试制度，并调整中学教学计划，削减古典学科和神学课时，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课程，使课程内容更接近实际生活。最后，建立现代新型大学。大学一改教会输送神职人员和为政府训练高级官员的传统，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使大学成为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机构。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是德国第一所

现代大学，它把研究成就作为评判大学和学者水平的关键指标。与此同时，国家保障研究投入和教授高薪待遇，以此保证学术研究顺利进行。在教学方面，课程设置也有新取向。神学课程教学被减少，哲学、法学和医学等现代应用学科课程增加。柏林大学因此成为德国学术研究的中心。

改革后的德国教育获得飞速发展。一是初等教育快速扩张。1816—1848年间，普鲁士适龄儿童入学率从60%上升至82%。二是中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文科中学学生在1816—1846年间增加七成，以市民子弟为服务对象的实科中学学生增长更快。三是涌现出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等一批以柏林大学为榜样的新型大学，各高校建立起各种研讨班和研究所，突出研究与教学的统一，科学研究成绩斐然。其中，吉森大学的李比希化学研究所和柏林大学的约翰·穆勒生理学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对化学和生理学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德国教育的调适和改革

如果说19世纪初教育改革是德国教育现代化的发端，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则是德国教育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和改革期。其间，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与教育现代化产生了良性互动，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推动着教育发展，教育则不断改革和调整，以满足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这一时期德国教育改革和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初等教育进一步扩张。各邦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保证学龄儿童入学率。到1864年，德国小学教育实际入学率已达85%。各邦还加大教师培养力度。1848—1872年，仅普鲁士的师范学校数量就从1848年的42所增至1872年的78所。此外，1853年考试条例还首次确认女性职业教师资格，女教师开始进入初等教育师资队伍。

中等教育在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类学校教育格局。一方面，面向大学教育、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文科中学数量增加近一倍，而面向社会实际需要、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实科中学和市民学校等“非正规”中学也迅速发展，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另一方面，实科中学等的教学内容设置进行紧跟社会发展需要的调整，加大了现代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比重。此外，这一时期以增加文化素养和培养小学教师为目标的女子学校开始兴盛。1850年普鲁士

已经有380多所女子学校。

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技术教育的专业技术学校等应运而生。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地先后建立起技术教育学校，主要用于培训工厂主、工程师等。19世纪30年代以后，因应工业革命需要，技术学校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四五十年代的增长尤其迅速。到19世纪50年代，许多技术学校毕业生已经成为工业界的技术领导和骨干。

大学教育在调适中进步。19世纪30年代后，因各大学坚持“纯”学术观念，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对工业实际应用技术的需要，与社会需求脱节，在读学生人数一度出现萎缩。为此各大学纷纷调整院系规模，以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结果，神学类专业学生明显萎缩，法学、医学等学生人数却保持适度增长。其中，哲学学院设立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人数增长最快。此外，这一时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也出现了以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转向。以化学领域为例，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化学工业迅速发展，大学中普遍建立起化学实验室，培养了大批量社会急需的化学博士。

## 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国成为教育领先国家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迅速转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教育领域也亟须调适和改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这一时期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普及小学教育有了实质性进步。1890年左右，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二是中学教育有新变化。一方面，各类中学数量激增，在校中学生数量较之前增长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原先仅文科中学毕业生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的规定被打破。1901年，更关注现代学科和现实需要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毕业生也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权利。所不同的是，三类中学毕业生在选择进入大学学习时有一定差别。文科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任何系科和专业学习，实科中学毕业生只能学习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高级实科学校毕业生只能进入技术高校等学习。此外，教学结构和内容也进行了调整。重视古典语言的文科中学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等课时量，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则将更多课时放到现代语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

上。三是职业技术教育出现新形式。为满足工业化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以企业徒工实习车间和厂校为模式的封闭式职业培训。徒工实习车间由一些企业专门建立，进行实践性培训，厂校主要进行理论培训。此外，这一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开始出现与新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接轨趋势。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大学教育的调适。一是大学办学规模扩大。在校大学生人数一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下降和停滞状态，呈现高速增长。二是大学学科结构调整。综合性大学各学科学生规模消长不一。神学等学科学生人数进一步下滑，拥有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哲学学科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上升至首位。法兰克福大学等新创立的综合性大学突破传统学科设置模式，增添自然科学、经济学等新学科，以适应德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三是创办商业高等学校和技术高等学校等新型高校。商业高等学校是经济繁荣的产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莱比锡、柏林、慕尼黑等各中心城市是其所在地。技术高等学校多数从早期的综合科技学校、技术专科学校发展而来，主要培养工业经济中专门性人才，设置有建筑、机械或机械制造、化学、冶金、数学甚至农学等系。四是人才培养模式变化，形成了以研究实验室为平台，推进教学与科研结合，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模式。五是各大学直接与生产前沿挂钩，在“研究和教学统一”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达姆施塔特高等技术学校的电技术讲座、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机械技术实验室等，都成了技术研究和产出的平台。六是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经费预算在1870年到1910年间增长4倍以上，其中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达50%以上。

以上教育的适时性改革和调适，为德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急需的人才和科技支撑。对此德国宰相俾斯麦曾感慨地表示，“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教育领先国家。它的中小学教育成了周边国家学习仿照的榜样。其大学教育的影响更是外溢至大西洋彼岸。在美国，不仅涌现出康奈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德式大学，甚至哈佛大学等也曾仿照德国大学办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作者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口述史让历史更加丰富鲜活

□ 张德明

近年来，口述史成为学界甚为活跃的前沿研究领域，吸引了多学科、多领域人士的广泛参与。口述历史是通过访谈记录和保存个人记忆与经历来研究历史的方法，可弥补传统文献史料的不足，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

传统历史文献记载人物和领域等史实有限，且多为静态史料，厚重有余生动不足，口述历史则可保存鲜活的个体记忆，填补传统书籍等历史记录的空白。此外，传统历史记载多关注重大题材，惯于宏大历史叙事，许多微小的历史事件未被文献记载。口述历史恰恰可以通过个体亲历者的讲述补充这些缺失的视角，揭示被忽视的历史微观侧面，提供传统史料难以提供的生动细节。

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可为致力于以小见大的微观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通过日常生活、情感体验等个体记忆折射宏观历史进程，通过个人小故事反映时代洪流的大变迁。当前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代表的“四史”领域的口述历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有许多重大历史题材需要通过口述访谈，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历与亲身感受予以记录和呈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期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诸多重大事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可以通过记忆来反映宏大历史，通过个体生命叙事丰富单纯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史书的记载。

口述历史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保存濒危历史记忆，实现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抢救性记录。如对目前还在世的老红军、抗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抗美援朝老兵以及年迈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获取其记忆，可以保留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具有重要的存史功能。

口述历史还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之前社会关注较少的无文字传统的文化，如少数民族口传史诗、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通过口述访谈保留这些历史文化资料，亦尤为重要。目前山东、浙江、北京、江苏等地都陆续出版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历史丛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此外，口述历史还具有实现“人人参与记录历史”的独特价值。口述历史将“人”置于历史中心，赋予历史多元视角，通过亲历者有血有肉的讲述增强历史感染力，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达到身临其境之感，从而呈现更多的历史温情，增强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口

述历史可以让普通民众真正进入历史，通过个人视角揭示被宏观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小历史”，带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近年来，在地方史、村史、家族史等乡土历史的建构中，对相关人士的口述访谈，使得大众对历史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大为提升。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为口述历史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让口述历史的呈现方式更加生动鲜活、传播载体更加丰富多元。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完善，口述访谈形成的录音、录像等史料载体，能保留声音、表情、肢体语言等非文字信息，可以充分还原历史现场感。在口述历史访谈的提纲设计、访谈资料的转化、后期整理及保存，以及利用口述史料开展研究等方面，研究者都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平台辅助进行，降低了参与口述历史的门槛。比如，在访谈前，利用大语言模型对访谈内容的相关史料进行信息检索与分析，可快速帮助访谈者获得对访谈对象的初步认知，提出针对性的访谈问题。同时，在口述历史作品的传播利用方面，还可充分借助网站、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最大限度地扩大口述历史作品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口述历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口述历史的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快速发展，口述历史研究领域日益拓宽，访谈对象的身份日趋多元。史学、科学、艺术、体育、旅游、建筑、教育等专题口述历史，以及工人、教师、艺术家、妇女、记者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口述访谈，成为口述历史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此同时，社会各界进行了大量口述访谈工作，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目前全国各行各业已完成访谈的口述史料，各地一些图书馆或档案馆也开始收藏利用。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已保留了大量的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的口述史料。

由上可知，不论是记录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与切身感受、对濒危历史记忆的抢救性记录，抑或实现“人人参与记录历史”，还是在各个领域的日益拓宽、访谈对象身份的日趋多元，口述历史这些独特功用和广泛应用无疑都有益于为历史研究提供生动鲜活的宝贵史料。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柬埔寨地处中南半岛，为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古代汉籍中，关于柬埔寨有多种称谓记载，如扶南、真腊、吉蔑、文单与甘智等，明代正式将其称为“柬埔寨”，一直沿用至今。自汉代起，中国便与柬埔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通有无、相互来往，这些交往见证了中柬两国绵延不绝的千年友谊。

中国与柬埔寨的海上交通早在汉代就已形成，《汉书·地理志》曾记载汉使远航至印度黄支等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显示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等地已有海上交通可以通达，此时海上贸易多由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商人入华经营。柬埔寨地处中印海上航线中间地段，扼守海上交通要道，在途经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的航线上有着重要地位，并与中国交往日渐密切。

1世纪柬埔寨扶南王国兴起，开地五六千里，扶南及其所属国珍物宝货无所不有。三国时期，中国与柬埔寨交往日益密切。吴国孙权积极发展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孙权派遣朱应与康泰出使扶南，得到了当时的扶南国王范寻热情接待，中国与柬埔寨缔结了友好邦交。同时，朱应、康泰分别著书《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对古代柬埔寨以及东南亚诸地历史风貌、人文社会等进行了详细记载。虽然这两本书原书佚失，但从《水经注》《梁书》《隋书》等书中可管窥一斑，为了解中国与柬埔寨的交往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史料。同时，扶南频向中国遣使开展友好外交往来，如扶南国王范旃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派遣使节来华。南齐永明二年（484年）、梁天监二年（503年）与十八年（519年），扶南亦纷纷遣使入华。

7世纪初，扶南被其属国真腊占领，柬埔寨进入真腊王国时期，立国长达1000年，7—16世纪经历早期真腊、吴哥王朝和晚期真腊3个时期。汉籍记载真腊其地接占城之南、南临三佛齐、东至海，有城围七十余里，石河二十余丈，战象四十余万，宫殿三十余所，极其壮丽，为周围诸国之都会。

唐代中国与海外诸地交通联系更为密切，唐代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亦途经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诸地。隋唐时期，真腊与中国交往密切，在建国不久真腊即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遣使来中国。唐代从立国以来直到唐中期安史之乱，真腊遣使来华不断，并多次贡献善舞的白象。其中“大历（766至779年）中，副主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擢婆弥试殿中监，赐名宾汉”，这里的“宾汉”即“中国上宾”的意思。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勃兴，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历久弥新、迅猛发展，达到了古代高峰。此时，中国与真腊的海外贸易联系较之以往空前密切，真腊扼海上交通之咽喉，北距占城半月余，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南距广州十日可到。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舶迎东北季风之便，过七洲洋、交趾洋至占城、真腊、三佛齐、锡兰、阇婆、渤泥、故临、大食等地，中国诸市舶司亦在每年十月份东北季风来临之时，犒劳蕃商并遣之出海贸易。其中真腊为中国商船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泉州西南诸国，近处以占城、真腊为诸国都会，泉州与西南诸国贸易也以占城和真腊为主。简而言之，在当时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地的贸易中，真腊为重要的核心地区之一。

元朝与真腊也交往甚密。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遣使出使真腊，周达观随从前往。周达观现在真腊期间，遍访各地风土人情，并以其见闻著成《真腊风土记》一书。周达观在书中详细记载了真腊的风土人情、物产习俗等。关于真腊贸易物资，周达观

记其地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翠毛、番油、姜皮、金颜香、苏木、生丝、棉布等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等物品。值得注意的是，周达观对真腊的贸易及其地华人也有详细的记载，其称真腊国人尤其是妇人皆善贸易，小笔交易则以米布，大笔交易则用金银交易，所以很多前往真腊的中国商人为贸易之便，多娶当地妇人为妻，有些甚至长期居留此地，在当地娶妻生子，并最早在该地形成了华人侨居之地。当地人十分欢迎中国商人，愿意与中国商人贸易，尤其喜欢中国铜钱、金银器皿、瓷器、丝绸、水银、硫磺等物，泉州所产青瓷在该地尤受欢迎、销量甚大。周达观的记载鲜明地呈现了中国与柬埔寨人民历史上友好贸易交往的状态，为认识中柬友好交往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

时至明代，明廷奉行睦邻和平策略，以“德”怀柔万国，强调“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在明初所定的“十五不征夷国”的名单中，真腊即在其中。同时，明廷将真腊纳入以和平互利为主要特征的朝贡体系。相较于占城、暹罗与安南三国明确规定为三年一贡，虽然明廷对真腊并未规定具体的贡期，但是据统计明代真腊向明廷遣使贡奉达14次，并多次贡献代表祥瑞的白象，彰显了中国与柬埔寨友好关系的赓续发展。

总体来看，古代历史上中国与柬埔寨的政治交往与经贸交往都呈现出和平友好的特点，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交往历史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中柬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贸易交往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如扶南乐舞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诗人王维曾写有《扶南曲歌词五首》。这些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历史上中柬两国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也充分证明连接中国与柬埔寨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政治与经济交往之路，亦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 古代历史上的中柬友好交往

□ 李大伟